

DOI: 10.16359/j.cnki.cn11-1963/q.2018.0048

晋西南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现状及其展望

王益人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 030001

摘要: 晋西南古称河东, 位于汾渭地堑中部, 包括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及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这里自古就是中华民族文明重要发祥地, 也是研究人类起源、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地堑发现了 300 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这些发现业已证明晋西南的临汾、运城以及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 从早更新世初期直到更新世结束一直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其中西侯度遗址、匭河遗址群、丁村遗址群、下川遗址群、柿子滩遗址群, 代表了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 200 万年以来从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一个完整的演化历程。因此, 这里成为中国大陆一个非常重要的远古人类演化场。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区域旧石器考古的回顾, 找出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以及需要努力的方向, 并向本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开拓者贾兰坡、王建、王择义等老一辈考古学家致敬。

关键词: 山西地堑; 晋西南; 旧石器考古; 人类进化

中图法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2018)04-0590-12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Southwest Shanxi

WANG Yiren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bstract: Southwest Shanxi is located in middle of the Fen-Wei Rift Valley, including the Linfen Basin, the Yuncheng Basin, and west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at the southern piedmont of Zhongtiao Mountains. Since the 1950s, more than 300 Paleolithic sites and locali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Archaeolog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human beings have been occupying this region since early Lower Pleistocene, lasting to the end of the Last Ice Age. Several carefully excavated archaeological sites, including Xihoudu, Kehe, Dingcun, Xiachuan, and Shizitan, compose a continuum of lithic industries. They suggest a complete

收稿日期: 2018-08-14; 定稿日期: 2018-10-24

基金项目: 2018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4-13-17-1400-016) 资助

作者简介: 王益人 (1960-), 男,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mail: wyr081@sina.com

Citation: Wang YR.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Southwest Shanxi[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8, 37(4): 590-601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during the last 2 million years: *Homo habilis*, *Homo erectus*, Archaic *Homo sapiens*, and *Homo sapiens sapiens*. Thus, Southwest Shanxi is a significant region of human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history in the last six decades, points out weaknesse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discusses several further directions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the 110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Jia Lanpo, one of the founders of Chines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Key words: Shanxi Rift Valley; Southwes Shanxi;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human evolution

1 引言

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就成为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最迫切的终极问题之一。上世纪 20 年代末，中国考古学家加入到寻找人类共同祖先探索的行列中来。1929 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当时最古老的人类祖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石英制品和用火遗迹^[1-2]，确立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学术地位；同时也使得中国乃至东亚成为全球人类起源研究最重要的地区。1959 年英国考古学家利基夫妇在东非奥杜维峡谷发现了东非人以及大批石器^[3]，使人类起源研究的重心从东亚转向了非洲。随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将人类起源的起点上溯到 400 万年前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和 600 多万年前之地猿（*Ardipithecines*）^[4-6]。

近几十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介入，人类学研究集中到现代人起源与演化问题上来，出现了“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连续进化说”两大阵营。西方学者主张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起源于 15~20 万年前的非洲一个女性，大约在 10 万年前又一次“走出非洲”^[7]，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类——称之为“夏娃理论”或“替代说”。与此同时，包括吴新智院士在内的一大批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欧亚大陆及澳洲的人类进化没有中断。这些地区的现代人是自最早走出非洲的远古人类连续演化而来的。在其形成和进化过程中接受相邻地区的基因贡献，但并未被再次走出非洲的“现代人”所替代——称之为“多地区连续进化说”^[8-11]。前者以基因材料作为依据，强调的是“扩散”和“替代”，后者则更侧重化石特征和旧石器考古证据的“区域演化”和“基因交流”。

从我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考古遗址来看，在整个更新世期间中国大陆上古人类具有强烈的连续演化的色彩和充分的证据。在这一点上，从华北南部的晋西南地区可见一斑。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贾兰坡、王建、王择义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在晋西南的临汾、运城以及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发现了 300 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这些发现业已证明，从早更新世初期直到更新世结束一直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其中西侯度遗址、匭河遗址群、丁村遗址群、下川遗址群、柿子滩遗址群（图 1），代表了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 200 万年以来从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一个完整的演化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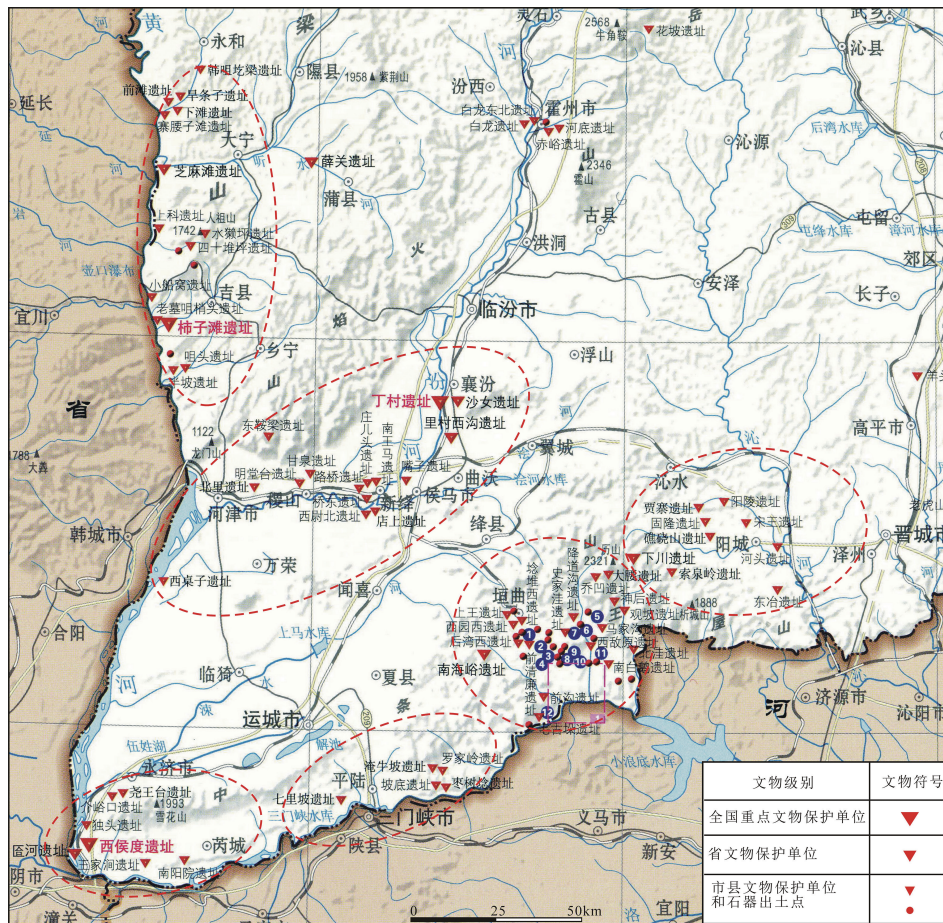


图1 晋西南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依《山西省文物地图集》)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Paleolithic sites in Southwest Shanxi

2 晋西南地区旧石器考古工作

2.1 丁村遗址

丁村遗址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发现、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也是打开晋西南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把钥匙。

丁村遗址发现于1953年，1954年9—11月，由贾兰坡先生带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共同组成发掘队，进行了首次调查发掘，在汾河东岸第三级阶地上发现了11个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点，共获得2005件石制品、27种哺乳动物化石和3枚“丁村人”牙齿化石。1958年出版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确立的以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为主的“丁村文化”^[12]填补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包括丁村遗址。

1976~1980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临汾地区文物局对丁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调查发掘。在汾河两岸的Ⅳ、Ⅲ、Ⅱ三个阶地中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12 处。使丁村遗址在空间、时间和文化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首先是时空分布上的突破：丁村遗址已不是仅限于 1954 年汾河东岸的 11 个地点的单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而是扩及汾河两岸，地点达 26 个，时代包括旧石器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的遗址群，这意味着丁村一带从 20 多万年前中更新世中晚期到 2 万多年前的晚更新世一直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其次，是文化分期上的突破：1954 年以来丁村遗址一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典型代表，但新的发现使丁村文化有了新的内涵，此次调查不仅发现了与丁村文化保持连贯的更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还发现了有别于丁村文化的加入了细石器成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13-14]。

2011 年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丁村民俗博物馆、襄汾县博物馆，在丁村遗址群南端柴庄附近和汾河东岸至塔儿山之间的黄土塬区进行了连续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新发现数十处旧石器地点，并对其中的石沟遗址、九龙洞遗址、过水洞遗址和老虎坡遗址进行了连续多年深入细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老虎坡人类活动营地、过水洞野炊营地和九龙洞石器打制营地等多个原地埋藏的层位，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丁村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生活轨迹及其行为链条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宝贵资料^[15]。

2.2 匭河遗址

匭河遗址分布于山西省西南端的芮城县风陵渡镇匭河村一带，是晋西南地区继丁村遗址之后发现的第二个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群。1957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至永济市独头村北涧，南至芮城县涧口南沟，长达 13.5km 范围内发现 10 多个旧石器地点，地质时代为中更新统早期。1959-1960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王择义、顾玉珉等与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王建在匭河一带再次深入调查发掘，确认了除西侯度 6053 地点和 6060 地点之外的 11 个中更新世早一阶段的石器地点。匭河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主要以石英岩为原料，有石核、石片和少量石器。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对首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和地质地貌进行研究，确立了以大石片制作的砍斫器、石球和三棱大尖状器为特色的“匭河文化”。研究者认为匭河遗址与石制品共生的动物化石中，不仅有肿骨大角鹿、扁角鹿、德氏水牛、三门马等华北中更新世的典型种属，还有第三纪残留下来的三趾马和师氏剑齿象。匭河文化所处的时代比北京人文化早，而与公王岭的蓝田人遗址同时或稍晚。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晚于西侯度文化而早于丁村文化，在文化发展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16]。之后，王建、陈哲英等分别于 1963、1978、1980、1992 年又在这里进行过多次调查发掘，发现的石器地点达到了 20 多个^[17-18]，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发掘资料始终没能公布。因此，学术界对匭河遗址文化性质的认识还停留在 1962 年发掘报告的基础上。

近十多年来，有学者对 6054 和 6056 地点的剖面进行黄土 - 古土壤序列年代学研究^[19-20]，认为两个地点的地质时代不尽相同，但测年结果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卫奇、

陈哲英等对匭河遗址的地质地貌进行研究,认为匭河遗址 20 个地点分别处于黄河的Ⅲ级阶地和Ⅱ级阶地上,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21],与动物化石资料及贾兰坡等人的认识存在较大出入,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2.3 西侯度遗址

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也是亚洲首次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人类文化遗址,位于山西省西南端黄河转弯处——芮城县风陵渡镇以北约 7 km 黄河左岸丘陵地带。1959 年发现,1961 和 1962 年由著名考古学家王建率领的考古队进行了两次发掘,获得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一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和若干石制品,据古地磁测定距今 180 万年。1978 年由贾兰坡、王建对西侯度遗址的地质地貌、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确立了西侯度文化^[22]。1988 年,国务院将之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侯度遗址从发现之日起就因河流相埋藏环境石制品遭受较为严重的磨蚀,受到学术界种种质疑,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又具有神秘色彩的科学大辩论^[23-28]。1998 年,张森水先生在《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一文中将西侯度遗址长期以来存在的学术争论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对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质标本”进行了重新评估^[29]。引起了新一轮的有关西侯度遗址石制品性质的讨论^[30-33]。

学术讨论属于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侯度遗址的问题仅仅停留在争论的层面上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还需要更多考古材料的佐证以及对遗址埋藏环境和形成过程的甄别。2005 年,笔者率队在西侯度遗址进行了 50 余天的发掘,获得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标本数百件,并在发掘方法、石制品打击痕迹与自然碰撞的对比、原料环境、埋藏环境、河流流向、砾石层的来源和走向等许多考古学相关性信息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得到了包括吕遵谔、张森水教授在内的学界权威认可。从初步观察的结果来看,新出土的石制品组合与 40 多年前的第一次发掘既有相近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总体上来看,西侯度石器工业保持了较为一致的技术特征,即以锤击和砸击法为主打制的简单粗制的器物组合,石核、石片、断块、碎屑占有很大比例,其中砸击石核和砸击石片较为典型有少量二次加工的粗制品,且略显简单粗糙。它们虽然有了一定的形制模式,然而比例很低。从石制品原料及砾石层岩性对比来看,可以用来加工石器的石英和石英岩原料只占全部砾石岩性的 10% 左右,而有人工打制特征的石制品仅为这两类砾石的 16.8%。充分说明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系人类选择特定的原料进行打击的结果^[34]。

2009 年以来,由南京师范大学沈冠军主持,山西省考古所王益人、美国普渡大学达里尔·格兰杰教授、南非金山大学凯瑟琳·库曼教授组成的国际团队,对西侯度遗址进行的²⁶Al/¹⁰Be 等时线埋藏测年研究,在测年和石器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测年结果显示,其年龄大于 200 万年,大大超出原来 180 万年的古地磁年龄,预示着西侯度遗址可能存在与欧亚大陆西侧的能人年代相近的远古居民。

2.4 垣曲盆地旧石器

垣曲盆地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一个山间盆地，也是较早集中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地区。1957年，王择义在盆地内的盘涧河、毫清河、沅河流域和同善镇发现了68处旧石器地点；除南海峪洞穴堆积外，均为旷野型石器地点；其中，14处产自红色土层中，53处为红色土地表采集^[35]。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南海峪遗址高出担山石河第一台地约6m的洞穴中，发现采用脉石英和燧石打制的石制品20余件，包括石片8件、石器13件；还发现用火遗迹以及犀牛、鹿、豪猪、猕猴等哺乳动物化石。根据堆积物和动物化石特征组合判断，遗址的时代为中更新世或稍晚^[36]。1970年，垣曲县博物馆吕辑书在历山大腰、柳水腰发现了多处下川文化内涵的细石器遗存；之后，该馆工作人员又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地点多处，使垣曲县境内的旧石器地点达到了150余处^[37]。

垣曲盆地是我国最早开始地质及考古学研究的地区之一。自1916年安特生在垣曲寨里土桥发现我国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一具完整的曙猿下颌骨——世纪曙猿（*Eosimias centennicu*）^[38]，更突显了垣曲盆地的重要地质古生物和考古学中的地位。垣曲盆地内普遍覆盖了老第三纪以来的土状堆积。盆地内水系发达，自西向东分布有五福涧河、毫清河、沅河、韩家河、西阳河由北自南注入黄河。旧石器遗存多半分布各条河流之间山岭上的红色土堆积中或地表。据记载，发现石片、石核等2000余件，其中出自地层中的有650余件。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至今有关垣曲盆地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地质时代和技术体系还不清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田野调查与发掘。

2.5 下川遗址群

下川遗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1973—197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王建、王向前、陈哲英等，在沁水、垣曲、阳城三县交界的近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连续数年的调查和发掘，发现16处细石器地点，获得1800余件石制品。包括细石器和粗大石器两大类。细石器以黑色燧石原料为主，类型有锥状、半锥状、柱状、楔状等各种形制的细石核和细石叶、尖状器、雕刻器、琢背小刀、石镞、石锯、锥钻、石核式石器以及各种样式刮削器等40余种。此外还有以砂岩、石英岩等为原料的砍斫器、镑状器、石锤、研磨盘等粗大石器。1978年王建等根据这些石制品组合确立了“下川文化”^[39]。

下川遗址是华北地区发现的首个具有地层依据的旧石器时代细石器遗存，其完整的器物类型组合以及系统的分类研究，为我国的细石器文化遗存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杆和分类模板，有力地推动了山西乃至我国细石器文化遗存的探索与研究，引起了日本和我国旧石器学界的广泛关注^[40-44]。1976-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共同进行了三个年度的发掘，获得了大量文化遗存^[45-46]。随后在山西吕梁山南端的蒲县薛关^[47]、吉县柿子滩^[48]，太行山西麓榆社盆地^[49]，雁北桑干河流域^[50]，河北的阳原泥河湾盆地^[51]，燕山南麓冀东平原的昌黎亭泗涧^[52-53]，以及鲁西南^[54]和苏北的马陵山^[55]等许多地区都找到了大量的细石器遗存，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分布带^[56]，对于探讨我国乃

至整个东北亚细石器的起源、时代特征以及技术体系的演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6 柿子滩遗址群

柿子滩遗址发现于 1980 年, 同年临汾行署文化局进行试掘。在 100 m² 的范围内出土了的石制品 1807 件。其中下文化层发现数量有限的粗大石器; 上文化层发现含有 755 件细石器成分的石制品 1700 多件, 有细石核、细石叶、各式刮削器和尖状器、石镞、石片、砍砸器等, 另外出土 2 件蚌制品。同时在阶地北侧石崖南端的天然岩棚崖壁上, 发现了两幅岩用赤铁矿石赭红色涂绘的岩画, 成为山西省罕见的史前原始艺术的见证^[49]。

之后, 柿子滩遗址发现者吉县文管所阎金铸在清水河流域作了多次调查, 在地点以东约 15km 的沿河两岸发现十余处同时期遗址或地点, 采集到数百件石制品, 基本界定了柿子滩遗址群的主要分布区域。2000 年以来, 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考古专业和吉县文管所组成的考古队在清水河下游确认了柿子滩遗址有 20 余处野外地点, 并对其中的 S5、S9、S12、S14、S29 等地点进行了连续多年的发掘, 出土石制品、动物骨骼和装饰品等文化遗物近 10 万件, 火塘等遗迹现象 300 余个^[57-65]。

柿子滩遗址群田野资料表明,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 位于黄河中游的晋西南地区, 绝对年代从距今 2 万多年延续到距今 1 万年之后存在着一个繁盛的狩猎采集集团。他们以燧石和石英砂岩为主要原料, 以楔形细石核、船底形细石核生产石叶细石叶, 压制法修理圆头端刮器、石镞、雕刻器等细石器类型的工具组合, 用石英岩制作的尖状器、卵圆形弧刃刮削器, 并使用石磨盘、石磨棒、穿孔装饰品。他们具有包括成熟细石器在内的石器制作技术, 直接打击与间接打击、压制修整技术, 用具有成熟的钻孔技术。

3 地质背景及遗址地理分析

晋西南古称河东, 位于汾渭地堑中部, 包括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及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 属黄土台塬地貌环境。本区域地处中国大陆第二阶梯(黄土高原)前沿和南北分界线北侧。在自然地理上介于“黑河-腾冲线”即“胡焕庸线”中点位置, 年降水量 400-600 mm。区域内水系发达, 吕梁山、太岳山、中条山、华山环绕周边。汾河谷地两侧、盆地四周以及中条山南麓巨厚的新生代黄土塬, 受新构造运动和河流切割的共同作用, 使这里形成了沟壑纵横的黄土丘陵地貌。良好的地层出露客观上为古人类遗骸及文化遗物的发现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 区域内山地、丘陵、盆地、河谷、湖泊发育, 地貌类型多样, 具有多样的生态环境, 为远古人类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现的西侯度文化、匭河文化、丁村文化、下川文化等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与该地区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适宜的生存条件是分不开的。

从这里的地质环境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来看, 由南到北由早到晚至少可以划出以下几个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

1) 风陵渡附近及中条山西南麓黄河沿岸: 包含芮城、平陆在内的中条山南麓向黄河

倾斜黄土丘陵地带和黄河阶地。这里背靠中条，面向大河，雨水充足，物草丰美。老第三纪以来的黄土堆积被切割成一道道深度数十米沟谷梁峁。发育齐全、出露良好的上新世以来的地层为我们寻找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提供了条件。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侯度、匭河、尧王台等遗址就分布在这两类地貌类型的砂砾层中；而平陆县境内发现的罗家岭、枣树埝等石器地点发现于中更新世红色土中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充分证明这里曾经是中国大陆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早期人类演化场。

2) 中条山东段的垣曲盆地：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理单元。与中条山南麓的芮城、平陆的黄土沟谷地貌不同，该区域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山间盆地构造，三面环山，南临黄河，中部为山间盆地，分为垣曲盆地、同善盆地两个小盆地，东北部与济源红土盆地相连，南隔黄河与滹池盆地相对。早更新世以来的红色土堆积广泛覆盖内；盆地西南部黄河北岸出露三门系地层，可见巨厚的砂砾堆积；晚更新世黄土堆积仅见于允水及黄河两岸，形成较高的丘陵堆积。发现了数量庞大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地点，靠近中条山主峰舜王坪附近的晚更新世堆积中发现多个下川文化性质的细石器地点。

3) 临汾盆地汾河谷地带：系汾渭地堑典型的盆地河谷地貌结构，更新统地层发育齐全。汾河两侧阶地及黄土塬水草丰美，资源丰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相当完备的物质资源。1954年以来，在汾河两岸及其支流发现了数以百计的以丁村文化为代表的远古人类文化遗存。从最新的发现来看，从5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到2万多年前的晚更新世中叶汾河流域一直有人类生存繁衍，体现了数十万年以来人类对这片热土的依赖与眷顾。

4) 太行山麓西侧和中条山腹地：以下川文化为代表的狩猎采集者，在这里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存环境。这里有茂密的森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优质的燧石原料，为狩猎采集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物质储备，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曙光到来之前的最后的狩猎者原始族群的样本。

5) 吕梁高原：这里东依吕梁，西临晋陕大峡谷，有厚重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地理环境。植被虽然没有中条山腹地的下川盆地丰富，但广袤的黄土地为这里的远古居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以吉县柿子滩遗址、蒲县薛关遗址、宜川龙王辿遗址^[66]为代表的原住民，在距今2万多年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创造出一个以两端尖状器、半月形刮削器、石磨盘、蚌饰品等器物组合为特征的，有别于下川文化的细石器文化。其分布范围遍及整个吕梁山南端的乡宁、吉县、大宁的黄河沿岸的各条沟谷^[67]以及蒲县昕水河流域，甚至远播太原古交石千峰^[68]、偏关万家寨以及内蒙清水河^[69]。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广泛分布于吕梁高原和晋陕峡谷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时代和生产力的发展来看，为探索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原始族群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对于探索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以及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4 研究现状及其展望

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在包括临汾、运城盆地在内的黄河中游晋陕豫三角地带,发现了山西西侯度、陕西蓝田人遗址、匭河遗址、大荔人遗址、丁村遗址、下川遗址、柿子滩遗址和河南三门峡旧石器地点等一系列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清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序列。然而毋庸讳言,这些发现还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开端,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东亚早人类脚踏地研究、直立人-早期智人演化以及石器技术研究等重大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高速发展,考古学与地质学、年代学、第四纪环境学逐渐融合,寻找这一区域远古人类完整演化的轮廓会越来越清晰起来。

4.1 东亚最早人类脚踏地的研究探索

众所周知,西侯度遗址作为我国最先发现的百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开启了东亚最早人类脚踏地的探索。随着元谋人、郧县人、蓝田人、东谷坨、小长梁、马圈沟等古人类旧石器的陆续发现,不断充实着中国早期人类演化的足迹。然而数十年来,西侯度遗址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和疑问,还有待于更多的发现来补充和证实。这就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接续前行。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考古人的足迹不到远古遗存不会自己出来报到。2016年我们曾在西侯度遗址附近早更新世或上新世地层中发现了几个明确的石器遗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和地层的确认。目前,200万年以上的人类遗存已经在黄河对面的蓝田上陈遗址发现予以公布^[70],显示了中条山南麓及晋陕豫三角地区更新世初期早期人类探索的巨大潜力。我们相信这里是寻找早期人类文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区,也必将做出应有的贡献。

4.2 直立人演化进程及石器技术

直立人阶段是人类演化及其重要且漫长的一个阶段(170-20万年)。从晋西南的地理位置和考古发现来看,中条山南麓、垣曲、临汾、运城盆地巨厚的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堆积中发现百余个石器地点,体现了这一区域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繁盛景象。然而这一阶段的探索目前为止还很不系统,除匭河、丁村遗址之外,大多数地点仅仅是简单的调查采集材料(至多在剖面上抠取到几块石制品),特别是垣曲盆地和中条山南麓广泛的红色土堆积中的石器地点,虽然发现的石制品数量有限,但系土状堆积原地埋藏环境,很可能成为解开这一地区百万年来人类演化的一个突破口。

如图1所示,已有的考古学成果呈现出的只是5个局部片区,还不足以完整地体现更新世期间人类演化发展的轨迹。这种片区状的格局并不是本区域内远古人类演化发展的真实写照,而是区域地质环境和考古探索已有的初步线索。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临汾盆地的汾河流域、中条山南麓、吕梁山南端都有数量众多的旧石器遗存被发现,而运城盆地偌大的涑水河流域,还基本上属于空白区。难道远古人类在汾河流域或其他地区活动,而忘记了这一大片土地吗?我们相信只要有人在这里做工作,掌握了这一区域旧石器遗址的埋藏规律,就一定会有大量的发现。

另一方面，是过去已经发现重点遗址或的深化研究，从近年来周口店、丁村、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来看，持续不断地对过去发现遗址的深入研究非常必要。上世纪中叶发现的西侯度遗址、匭河遗址、以及垣曲盆地的发现与研究还很粗浅。匭河遗址虽然前后经过 5 次发掘，但 1963 年以后的发掘资料始终没有公布，严重影响着匭河遗址的考古学研究进程。类似的问题还有垣曲盆地，据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垣曲盆地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170 余处。但从资料上来看，除南海峪遗址有过一次短暂发掘外，大多数仅仅做过粗浅调查的考古线索，获得的石制品数量有限。因此，笔者戏称其属于“地层依据不清、时代难以定论、文化面貌模糊”的“三无产品”。2017 年我们对垣曲盆地进行了一次短暂考察，对垣曲盆地登记在册的 27 处地点进行了核查，新发现旧石器地点 14 处，其中有 17 处发现于中更新世以来的土状堆积中，4 处发现于河流相堆积中，获得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50 余件。时代以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早期为主，个别地点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从此次调查来看，垣曲盆地的旧石器遗存较为丰富，原地埋藏特点明显。但石制品散布于巨厚的中更新统红色黏土和晚更新统土状堆积中，必须经过较大规模深入细致的发掘，才能揭开其庐山真面目。

4.3 早期智人演化及其现代人起源研究

早期智人演化及其现代人起源是近年来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丁村遗址群的研究来说，近年来在黄土地层中的发现令人振奋，在老虎坡遗址的发掘，在距今 5-20 万年的地层中发现多个人类遗迹和大量石制品。表明在中更新世之晚更新世的最后冰期内，在这里一直有人类生存的痕迹。因此，丁村遗址群持续不断的发掘必将是解决丁村早期智人源流的一个突破口，更需要汾河中下游乃至运城盆地旧石器考古发现的支撑。此外，丁村 77:01 地点细石器遗存与中期文化之间尚存在较大的缺失。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学理念转变以及考古全覆盖式调查的投入，将会有更大的成果和突破。我们相信在晋西南广泛的马兰黄土乃至汾河、涑水河流域二级阶地堆积中保留了晚更新世早期（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本区域晚期智人阶段的考古发现并不缺乏，特别是下川遗址群、柿子滩遗址群的研究，对于研究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演化、细石器技术起源以及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但两个区域都位于晋西南东西两侧的中条山腹地和吕梁山南端。而中间的汾河谷地和运城盆地的涑水河流域存在着大片空白区，需要考古人去不断探索。笔者认为临汾、运城盆地内 2-3 万年之间的时间段里细石器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是解开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源流的重要篇章，并寄希望有更多的考古发现。

以上论述是我们对晋西南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一些体会和希望，也仅仅是从考古学研究最基础的区域调查传统方法和资料收集层面的谈一点看法。从最新的考古学理论来看，晋西南地区在长达 200 万年的时间里，不同阶段狩猎采集者的流动觅食、原料采办等行为模式的探索和文化阐释，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厘清的，需要更多的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因此，将晋西南比拟为东亚人类演化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加宏大的考古学愿景，有赖于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去努力奋斗。

谨以此篇纪念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贾兰坡教授诞辰 110 周年！

参考文献

- [1] 张森水. 裴文中传略与浅析 [J]. 文物春秋, 1994(supp): 3-23
- [2] 高星. 论裴文中先生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贡献与影响 [A]. 见: 裴申, 高星编. 不朽的人格与业绩: 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 100 周年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4-16
- [3] 理查德·利基 (著), 吴汝康, 吴新智, 林圣龙 (译). 人类的起源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 [4] Toth N, Schick K. African Origins [A]. In *The Human Past: World Prehistory &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 (3rd edition), edited by Chris Scarre, Thames & Hudson Press, 2013: 46-83.
- [5] 吴新智. 人类进化的足迹 [M].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
- [6] 吴新智, 徐欣. 探秘远古人类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 [7] Cann RL, Stoneking M, Wilson AC. 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 [J]. *Nature*, 1987, 325 (6099): 31-36
- [8] 吴新智. 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 [J]. 人类学学报, 1990, 9 (4): 312-321
- [9] 吴新智. 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 [J]. 人类学学报, 1998, 17 (4): 276-282
- [10] 高星, 张晓凌, 杨东亚, 等. 现代中国人起源与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 [J].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10, 40 (9): 1287-1300
- [11] 高星, 彭菲, 付巧妹, 等. 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研究进展 [J].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17, 47 (9): 1287-1300
- [12] 裴文中, 吴汝康, 贾兰坡, 等.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13] 王建, 陶富海, 王益人.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 [J]. 文物季刊, 1994(3): 1-75
- [14] 王益人.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丁村遗址群 1976-1980 年发掘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 [15] 王益人, 袁文明, 兰会才, 等. 2011 年以来丁村遗址群考古新进展 [J]. 人类学学报, 2018, 37 (3): 276-282
- [16] 贾兰坡, 王择义, 王建. 匭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 [M].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五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2
- [17] 陈哲英. 独头旧石器的新发现 [A]. 山西省考古学会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二).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45-57.
- [18] 陈哲英. 匭河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A]. 贾兰坡和陶正刚编: 阳光下的山西——山西考古发掘记事.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80-87
- [19] 文祥, 刘东生, 陈哲英. 匭河旧石器遗址 6054 和 6056 地点地层的再研究 [J]. 地层学杂志, 2001, 25(4): 303-306
- [20] 孙建中. 黄土学 (上篇) [M]. 香港考古学会出版, 2005
- [21] 卫奇, 陈哲英. 匭河遗址群考证 [J]. 高星, 刘武主编. 纪念裴文中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 人类学学报, 2004, 23(supp): 145-161
- [22] 贾兰坡, 王建. 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 [23] 裴文中. “曙石器”问题的回顾——并论中国猿人文化的一些问题 [J]. 新建设, 1961(7): 12-23
- [24] 贾兰坡. 谈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和曙石器问题——与裴文中先生商榷 [J]. 新建设, 1961(9): 18-27
- [25] 吴汝康. 从曙石器问题谈到中国猿人是否是最早人 [N]. 光明日报, 1961-09-06
- [26] 裴文中. 中国猿人究竟是否最原始的“人”——答吴汝康、贾兰坡二先生和其他同志 [J]. 新建设, 1962, (4): 28-41
- [27] 贾兰坡. 中国猿人不是最原始的人——再与裴文中先生商榷 [J]. 新建设, 1962 (7): 54-67
- [28] 捷夫. 关于“曙石器”和中国猿人是否为最原始人类问题的讨论 [J]. 考古, 1962(4): 216-217
- [29] 张森水. 关于西侯度的问题 [J]. 人类学学报, 1998, 17 (2): 81-93
- [30] 黄慰文. 关于华北早更新世人类活动的问题 [A]. 见: 徐钦琦等主编. 史前考古学新进展 - 庆祝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科学出版社, 1999: 63-68
- [31] 卫奇. 《西侯度》石制品之浅见 [J]. 人类学学报, 2000, 19(2): 85-96
- [32] 陈哲英. 关于《西侯度》存在的问题 [A]. 龙骨坡史前文化志, 2000, 2 (2): 82-86
- [33] 李炎贤. 关于西侯度的石制品的讨论 [A]. Lee Yong-jo (ed.). *Palaeolithic Men's Lives and Their Sites—Commemorating 40 years for Palaeolithic Studies*. 韩国: 学术文化社, 2003, 255-278
- [34] 王益人. 关于西侯度问题的思考 [A]. 高星, 石金鸣, 冯兴无编. 天道酬勤桃李香——贾兰坡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科学出版社, 2008, 193-203
- [35] 贾兰坡, 王择义, 邱中郎. 山西旧石器 [M]. 科学出版社, 1961

- [36] 王择义, 邱中郎, 毕初珍. 山西垣曲南海峪旧石器地点发掘报告 [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59, 1(2):88-91
- [37] 垣曲县博物馆编. 垣曲考古 [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38] K Christopher Beard, Yongsheng Tong, Mary R Dawson, et al. Earliest complete dentition of an anthropoid primate from the late middle Eocene of Shanxi Province, China[J]. Science, 1996, 272 (5258): 82-85
- [39] 王建, 王向前, 陈哲英. 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 [J]. 考古学报, 1978(3): 259-288
- [40] 贾兰坡. 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 [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79, 17(2): 137-143
- [41] 邓聪. 雕刻器情牵万里——长忆王建先生 [A].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 珞珞集——王建先生 90 周年诞辰纪念文集 [M].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8
- [42] 佐川正敏.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群变迁关系 [A]. 考古学论丛. 宁乐社, 1983: 137-169.
- [43] 邓聪. 中国华北における下川石器群の考察 [A]. 始良火山噴火後の九州とその人びと, 熊本市国際交流会館, 1995: 114-123.
- [44] Tang Chung.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 China: The Xiachuan Culture[J]. Brill, Leide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000, 21(2): 37-49
- [45] 石兴邦. 下川文化研究 [A].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 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 [47] 王向前, 丁建平, 陶富海. 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 [J]. 人类学学报, 1983, 2(2):162-171
- [48]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 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 [J]. 考古学报, 1989(3): 88-91
- [49] 刘景芝, 王太明, 贾文亮, 等. 山西榆社细石器遗存 [J]. 人类学学报, 1995, 14(3): 206-218
- [50] 陈哲英. 山西细石器研究 [A].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三).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207-219
- [51] 谢飞, 李珺, 刘连强. 泥河湾旧石器文化 [A].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6.
- [52] 李珺, 王恩林, 颜乐耕. 河北昌黎亭泗涧细石器地点 [J]. 文物春秋, 1992(supp): 121-127
- [53] 王恩霖. 河北昌黎亭泗涧细石器遗址的新材料 [J]. 人类学学报, 1997, 16(1): 1-10
- [54] 沈辰, 高星, 胡秉华. 山东细石器遗存以及对“凤凰岭文化”的重新认识 [J]. 人类学学报, 2003, 22(4): 293-307
- [55] 张祖芳. 瓜墩文化——苏北马陵山瓜墩遗址调查报告 [J]. 东南文化, 1987(2): 1-18
- [56] 谢飞. 河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存的分布在华北马蹄形分布带中的位置 [J]. 文物春秋, 2000(2):15-25
- [57] 柿子滩考古队.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 S14 地点 [J]. 考古, 2002(4): 304-316
- [58] 赵静芳. 柿子滩遗址 S12 地点发现综述 [J]. 考古学研究 (七).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59] 柿子滩考古队.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第九地点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0(10): 7-17
- [60] 柿子滩考古队. 柿子滩遗址第十四地点 2002-2005 年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3(2): 3-13
- [61] 宋艳花, 石金鸣.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 S12G 地点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13(3): 3-8
- [62] 宋艳花, 石金鸣. 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装饰品研究 [J]. 考古, 2013(8): 46-57
- [63] 宋艳花, 石金鸣, 刘莉. 从柿子滩遗址 S9 地点石磨盘的功能看华北粟作农业的起源 [J]. 中国农史, 2013(3): 3-8
- [64] 宋艳花, 石金鸣. 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第五地点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6(4): 5-17
- [65]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 S29 地点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7(2): 37-53
- [66] 尹申平, 王小庆. 陕西宜川县龙王辿旧石器时代遗址 [J]. 考古, 2007(7): 3-8
- [67] 王向前, 阎金柱, 丁建平. 黄河龙门水库考古调查报告 [A].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一).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62-65
- [68] 王向前, 丁建平. 太原古交石千峰一带地细石器 [J]. 山西文物, 1982(1): 3-8
- [69] 张森水. 内蒙中南部和山西西北部新发现的旧石器 [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59, 1(1): 31-40
- [70] Zhaoyu Zhu, Robin Dennell, Weiwen Huang, et al. Hominin occupation of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since about 2.1 million years ago[J]. Nature, 2018, 559(7715): 608-612